“懒惰的穷人”的产生：一种贫困发生的

新型解释框架

——基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林村实地调研的思考

田甜 李博 左停¹

【摘要】：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懒惰的穷人”被认为是最后的“障碍”，多以“内生动力不足”来简单定义这一群体。学术界需要突破“素质贫困”“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限制，尝试运用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贫困的发生。“懒惰的穷人”是在世界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具有道德劣势的人格主体，并已经在我国的道德话语中扎根。在本文的解释语境中，穷人并不是因“懒惰”而致贫，这背后存在着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结构性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家庭与个人等诸多因素。但是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却在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要求下，成为具有道德缺陷的“懒惰的穷人”。依靠“精神扶贫”对“懒惰的穷人”进行“扶志”远远不够，相关研究和国家政策应致力于破解结构性困境，探讨制度建设，防止道德污名化。

【关键词】：贫困 懒惰 扶贫 结构 制度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1)-02-0037 (11)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府以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克难攻坚阶段。扶贫干部抱怨贫困户“懒病缠身”、“等靠要”思想盛行，“因懒而穷”的贫困户成为脱贫攻坚最后的障碍。基层和中央政府都对“扶贫养懒汉”，不能“真脱贫、脱真贫”的倾向感到担忧，类似话语在新闻媒体^[2]和学术研究^[1]中也多有出现。

“懒惰的穷人”引起了我国减贫研究和实践的广泛关注。在近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文件中多用“精神贫困”来指代“懒惰的穷人”，由此将致贫原因内生化。贫困人口因主观因素而影响脱贫即为“精神贫困”，是农村贫困人口处于长期贫困的内在根源，^[2]其行为表现为观念保守、目标模糊、^[3]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4]有的研究甚至将其归结于价值观障碍、人格问题、^[5]认为其本质是个体失灵，具体来说是在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的结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2017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提出要“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地方各省市遂纷纷从道德教育、文化下乡、思想政治等方面入手开展“精神扶贫”工作。

在“精神贫困”提出之前，曾由“素质贫困”或“文化贫困”来指摘贫困人口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

¹**基金项目**：2019 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陕西省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机理与政策研究”（编号：19jk04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田甜 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193

李博 副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左停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193

²①贫困户沉迷麻将惹干部：我脱不了贫你们交不了差，新华每日电讯网，2018 年 3 月 30 日。

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终守故土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6]20世纪90年代前后，关于“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的理论探讨在中国学术界属于热点问题，^[7]这产生于我国第一轮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扶贫计划的背景之下。1986年由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虽然使得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产生了减贫效果，但是农村减贫难度开始加大，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显著放缓：^[8]1978-1985年年均减贫人口为1786万；而在1985-1990年期间，年均减贫人口下降为800万，1991-1995年为392万。^[9]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入与边缘地区脱贫效果不显著造成的反差，使得研究者开始将传统文化、个人素质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与产生“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的背景相似，现在“精神贫困”的提出也出现在扶贫攻坚战的攻坚克难阶段。自2015年开始，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每年200亿元的规模增加，从2016年到2020年总计已经达到了5305亿元。在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之下，每年减贫人数达到上千万人，^①2016年到2019年每年减贫人数分别达到1240万人、1289万人、1386万人和1109万人，^②2020年最后一年的减贫任务只剩下551万人。但是脱贫攻坚工作愈到最后愈艰难，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推动现存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的难度也更大。从工作在扶贫第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到扶贫政策和减贫研究层面都开始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作为其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

“精神贫困”、“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都是在国家大规模减贫干预的艰难时期，忽视结构制度因素，将致贫原因内生化的归因结果。但为什么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即“懒惰的穷人”这一群体的形成和贫困发生的机制是什么，有关的学术研究还相对缺乏。不仅在学术探讨中欠缺对“懒惰的穷人”严肃的回应，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对这一群体和现象的简单标签化。“懒”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定义为“痴呆傻”的精神残疾。“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贫先扶志”是国家和学界对前期扶贫工作的反思，“精神扶贫”却在路径依赖中继续使用张贴标语、政治动员、典型示范等运动式治理手段，顺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以穷人“懒惰”作为扶贫难的托辞，使得穷人“懒惰”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固化。

“懒惰的穷人”这一行动主体和扶贫遇“懒汉”的发展困境需要新的解释框架下寻求新的答案。本文试图跳出“精神贫困”、“文化贫困”和“素质贫困”的分析视角，首先回溯在世界社会经济体系中贫困与懒惰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使得“懒惰的穷人”被置于道德的凝视之下成为带有负面色彩的语汇；其次回归到解释贫困发生的框架之中，基于对中国黔西南州林村的实地调研，对“懒惰的穷人”这一他者眼中的行动主体的形成原因进行诠释。在本文中，笔者从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结构性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家庭与个人等多角度来分析为何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在大规模国家扶贫干预下仍然陷于贫困陷阱，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本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懒惰的穷人”在国家干预贫困的合法性压力下成为了脱贫攻坚最后的“障碍”。

二、“懒惰的穷人”：在世界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的道德主体

在17世纪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大批穷人、失业者、“游手好闲”的人被收容在名为“总医院”、“教养所”、“慈善院”的监禁中心。为了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必须接纳自愿来的或被政府和司法机关送来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保证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整洁外表和基本健康。同时，在监禁中心“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都必须在工作日干活。这样才能避免万恶之源——游手好闲，同时使他们习惯于诚实的劳动，并能挣得维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福柯认为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是由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的，^[10]在监禁中心，劳动作为惩治和改造穷人道德缺陷的重要手段被制度化。

可见在17世纪的西欧，贫困与劳动被置于简单的对立关系。到了18、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则与勤劳划上了约等号，懒惰成为了穷人的重要特征。工业资本主义大生产之下，工作中的时钟时间(clock-time)节律不断强化“劳碌主体(busyself)”的存在，在时钟时间的支配下，劳动逐渐被认为是时间的持续，而非以任务为导向的活动。^[11]业生产活动通过计

^①①财政部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达1461亿元，中国政府网，2020年12月3日。

^②②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红旗文稿，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彰显我国制度优势，2020年12月23日。

件和计时工资对工作者提出了“勤劳”的要求。工厂里出现强制性的 14 小时劳动，众多小孩和妇女甚至工作到 16 个小时。^[12] 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亚当·斯密将“勤劳”和“游惰”对立起来，勤劳是资本积累的首要原因，游惰则不然。^[13] 马克思·韦伯也指出“勤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14] 与之相比，在工业资本主义中“懒惰”就成为了负面的主体性特征被贴在资本缺乏的穷人身上。工业资本主义在“懒惰的穷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 17 世纪的西欧也初见端倪：第一批改造游手好闲的穷人的监禁中心正是出现在最为工业化的城市：英国的伍斯特、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里昂；德国的汉堡。^[15]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懒惰的穷人”又成为了欧洲殖民者对非欧洲民族（非洲，^[16] 东南亚，^[17] 南亚^[18] 等地）的一大刻板印象。这不仅是文化中心主义导致的偏见，还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化的目标中寻求西方统治正当性的重要内涵。20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被确立下来，“懒惰”也成为了马来西亚当地富人拒绝雇佣同一个社区穷人的措辞，以使其使用联合收割机、用机器取代薪资工人的行为正当化。^[19]

我们曾经对此劳动道德进行反思、争取“懒惰权”，但是在获得了一定的劳工福利后，这种对劳动道德的批判却在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忘却了。19 世纪，西欧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相继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工业化大生产得到巩固，工人阶级权力意识也在这一时期觉醒。1883 年保尔·拉法格 (Paul Lafargue) 在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如何规训大众 (尤其是工人阶级) 的基础上提出，比起在革命和工人运动中要求“劳动权”，工人阶级更应该努力争取“懒惰权”：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摒弃基督教道德、经济道德和自由思想道德的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宣布他们有懒惰权。^[20] 正如偷懒也是马来西亚农民弱者的武器，用以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21] 对劳动道德的批判促进了西欧国家缩减劳动时间，改善劳工福利。

19 世纪晚期，贫困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转移了人们投之于建设积极自由公共领域方面的注意力，对民主的追求不得不降格以求，使与“缓解贫困”和暗含消费主义色彩的“追求自身物质消费”画上了等号。^[22]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强化了“懒惰”与“贫困”的重要联系，“懒惰的穷人”成为具有道德劣势的人格主体。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二战”后主要的福利国家陷入了滞涨危机，新右派在经过战后 30 年的对抗后，趁此提出了新自由主义主张，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福利国家退场，新自由主义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他们最主要的主张是：自由市场具有生产效率最大化的自动调节机制，能够公平地分配文明生活所需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需求。其中，在社会方面，个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社会系统也就能确保道德价值的最大化，这和经济方面自由市场能使物质利益最大化一样。^[23] 市场介入公民的生活，个体逐渐社会原子化，只有市场能将其组织起来，公民由此成为了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纯粹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贫困的原因被归于个体的懒惰，结构和制度变得隐秘起来。

总之，从世界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兴起于 17、18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将劳动作为惩治和改造穷人道德缺陷的重要制度化手段，“勤劳”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懒惰”则是缺乏资本的穷人的主体性特征；在 19 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扩张的影响下，“懒惰的穷人”不仅成为了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还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化的目标中寻求西方统治正当性的产物；从 20 世纪开始盛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将公民定义为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纯粹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贫困的原因被归于个体的懒惰，结构和制度变得隐秘起来。由此，贫困群体成为了具有道德缺陷的“懒惰的穷人”。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虽未与西方同步，但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却与英、美在同一时间发生。1978 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中央政府宣布了经济改革规划，开启改革开放之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市场化和货币化成为快速进行资源分配的手段。在建设小康社会、先富带后富的宗旨之下，覆盖农业、工业、金融、分配、消费和投资等领域的市场机制被建立起来，宣告了集体制的解体。个体化的“个人责任体系”也从农业领域蔓延开来，集体性社会福利伴随着“公社”和“单位”的解体而消散，国家逐步将医疗卫生、公立教育、社会服务与保障交给市场，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再次被重塑，并塑造了大众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同：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24] 经过五

十余年的强调市场化的公共政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想象在我国的道德景观中扎根。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也有诸多对时间节律的强调，例如“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纪年”、以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俗语等等，同时也有“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说，但都与农业生产相关。在均贫富的思想下，对懒汉的道德谴责从未甚于今日。“懒惰”是在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中成为与“勤劳”、“效率”、“理性”相悖的负面语汇，并在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成为贫困的首要解释原因，因此“懒惰的穷人”成为了具有道德劣势的人格主体。

我国大规模减贫计划和行动始于正视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致力于破解结构性桎梏，但随着巨大的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到了脱贫工作的后期仍旧存在着难以脱贫的贫困人口。人们因此认为，外力干预无效，则必定是内因的问题，这与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想象和现代性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应该回到解释贫困的整体性框架之中来分析“懒惰的穷人”。

三、扶贫任务中的“懒惰的穷人”

2016年，位于贵州黔西南的林村开展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工作，该村贫困发生率达到15.5%，被列入省一级贫困村。同年，该村户籍人口2014口人，567户，人均年收入仅有4000元左右。林村国土面积11.95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壤贫瘠，山地林立。林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以玉米种植为主，是一个以性别和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贫困村。通过“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到2018年林村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以下，实现了贫困村脱帽。在本课题组的调研过程中，扶贫干部抱怨说：“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有劳动能力，但是没有发展意愿的懒汉们，简直像‘扶不起的阿斗’”。为此，林村挂出了“贫困落后不光荣，好吃懒做难娶妻”的横幅标语。

通过访谈，笔者被告知林村有这样五位“懒惰的穷人”：甲、乙、丙、丁、戊（详情见表1），其中四人为男性，受教育水平低，年龄偏长，单身或家庭规模小。村民戊为贫困女性，其家庭人口结构相对复杂，他们没有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和契约劳动，未受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时间节律的规训，不能保持内务的整洁干净，违背了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因此村民和扶贫干部将他们视为“懒惰的穷人”。

“懒惰的穷人”对脱贫攻坚中的政府干预项目都不为所动，基层工作人员面对内生动力不足的“懒汉”，往往无能为力，或只能采取低保兜底的措施。但是这种消极应对措施和对“懒惰的穷人”的“内生动力不足”的简单概括都无助于我们认真理解和分析“懒惰的穷人”的成因，更无助于脱贫攻坚的顺利实现。

四、“懒惰的穷人”形成原因分析

“懒惰”曾被定义为“精神贫困”、“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的特征，即对极低生活水平和生存现状的听天由命、对社会变迁的无力感、对政策变化的不适应感，以及整体性地缺乏自信、缺乏竞争意识、缺乏财富追逐观念，等等。^[25]但是我们不能仅将贫困归因于“贫困文化”、家庭与个人原因等因素，

表1 林村“懒惰的穷人”的具体个案

个人和家庭情况	他者描述“懒惰的穷人”的具体语汇
---------	------------------

村民甲 45岁，男， 小学文化， 已婚，育有 一女	帮扶干部为村民甲在市医院找到了一份保洁工作，他工作两个月之后便辞职回到村中，扶贫干部上门劝说也不再愿意回到市区工作，由此村民甲成为了扶贫干部口中所说的“懒汉”。
村民乙 53岁，男， 文盲，离异 独居	村民乙的住房建于1989年，其中一间房一直未盖上屋顶，屋外被石头、杂草和玉米围绕。因为年龄问题他务工时间越来越少，一年之中除了在邻省做搬运工两个月，多闲赋在家。村民们认为“好好的人，只要卖力干活就不会受穷”。当扶贫项目进村后，他没有积极参与其中，更加印证了其“懒汉”形象。
村民丙 48岁，男， 文盲，单身 独居	村民丙没有参与林村的产业扶贫和劳动力转移等所有的扶贫项目，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最后只能对他采取了低保兜底的扶贫措施。市扶贫办要求所有贫困户实现“改厕、改厨、改圈”的三改标准，但是他抱怨说没有钱和人手建房，到了最后的考核期，还是由市扶贫办拿出扶贫资金为其房屋进行改建。
村民丁 50岁，男， 小学肄业， 单身独居	村民丁他没有兴趣参与林村的扶贫产业，他只想继续种玉米养猪，并说“吃饱饭就可以了”。他自己种有菜园和玉米，用玉米和猪草养猪，年底卖出肉猪以还清去年买猪仔、种子和化肥的欠款，还能留下腊肉、香肠和猪油供来年之需，平时不购买食品也不添置衣物，一个月的日常花销不到100元。
村民戊 38岁，女， 小学文化， 离异与父 母同住	村民戊离异后带着7岁女儿回到娘家，与父母、哥嫂共同居住，平日在家与母亲共同照顾女儿和两个侄儿，没有外出务工。村民戊不属于贫困户，无法参与到林村的产业扶贫和劳动力转移等所有的扶贫项目之中。因为她没有工作和经济收入，被村里人说“整日在村里晃荡，什么事情也不干”。

还需要更加仔细的分析。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结构和能动的二元论(dualism)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duality),因此我们在讨论“懒惰的穷人”时,村民们以发展为目的的能动性不足直接与结构性原因相关。“懒惰的穷人”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背后存在着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结构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家庭与个人等多重原因。因此,在大规模国家扶贫干预下,仍然存在着一部分陷于贫困陷阱,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的低收入群体,并在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要求下,成为了他者眼中的“懒惰的穷人”。

1. 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下“懒惰的穷人”

过去四十年来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全国性贫困格局基本消除，但是区域性整体贫困尚未发生根本改变。^[26]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2007—2009年3年的县域人均生产总值、预算收入、农民收入等指标划出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④将其确定为新时期扶贫的主战场。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区都是深山石山区、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区和生态保护区，它们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但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对2012年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受资源环境承载力制约十分显著，其分布格局与资源环境要素约束具有较强空间耦合性，呈现出区域总体承载力较弱、资源环境负荷超载、要素间变化响应敏感、承载力提升潜力受限以及超载后修复代价巨大的基本特征。^[27]在乡村社区内，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来源相对有限，更加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又是直接受到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下，资源难以转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即使产生了有限的资源收益，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居民也很难从中获利。而且在生态脆弱区容易陷入因为贫困而产生资源争夺和过度开发，进一步导致生态退化和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即使引入生态保护机制后也存在着因生态保护而使得资源利用受限，因而导致贫困的问题。

林村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四周山地林立，土壤储水能力差，土层薄，以玉米种植为主。该地为雨养农业，没有地表河流流经，降雨量丰富但无储水能力。林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农业生产十分受限。气候冬暖夏凉，雨热同季，气候灾害以旱灾为主，时有冰雹大风洪水天气。2016年的洪水就让林村的养殖户损失惨重。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不仅难以实现农业积累，而且因为深处群山之中，经济生产、社会交往都十分不便，林村市场、金融、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很差。

2. 区域经济因素影响下“懒惰的穷人”

作为城乡二元结构和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具有亦工亦农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群体是中国新增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8]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实现了“输出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批”的减贫发展实效。但是近年来城市不断增长的生活成本成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大阻力，同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的市场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改变，农民工就业难度增加。根据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移民根据其在农村和城市所能获得的预期收入来判定是否迁移，预期收入主要由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共同决定。迁移者在进行迁移时必须确保城市获得的工资在高于农村工资的同时应弥补其迁移成本。^[29]除了实际的就业成本和就业收入的考量之外，同伴的就业情况以及往期的就业行情都会对村民的就业预期收入产生影响，当实际就业收入低于村民的预期收入时，外出务工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在此，我们除了指出区域经济环境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之外，还要对“懒惰的穷人”不具有经济理性这一观点进行澄清。

村民甲因为不愿意在城镇工作，并放弃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成为扶贫干部口中的“懒汉”，但是通过外出务工的成本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一举措是具有经济理性的选择。虽然村民甲在市医院从事保洁工作能得到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一年就能实现总收入24000元，完成脱贫任务，但是扣除他在市区生活需要付出房租、食品、往返交通等各种生活费用之后，每月工资所剩无几。因为城市生活昂贵的生活开支增加了其务工成本，消费致贫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村民甲来说，在城市每日八小时的工作过后并无结余，回村从事农业生产虽然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少，但是净收入相差不大，而且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更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8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总量增速放缓，比上年回落了1.1%，在农民工总量中，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增长了0.9%，在外出农民工总量中进城农民工则下降了1.5%。^⑤返乡就业潮在林村表现得非常明显：2016年春节过后，村里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不再出省，均回到本市工作，到了2019年春节时，多位村民抱怨去年没有按时结算工资，到了3月还有多位青壮年村民闲赋在家没有外出务工。

^④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以及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

^⑤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4月29

3. 结构性困境中“懒惰的穷人”

林村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地理区位、城乡二元结构之中，都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林村村民难以逃离的结构性桎梏。林村村民陷于此结构性困境中，难以寻求更好的个人发展。

中国在国际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极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要求农村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但是位于西南边远山区的林村村民，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均为简单的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玉米是当地主要的农作物，该村无任何农产品加工、运输或销售企业，在农业产业链中位于下游；村民外出务工多以建筑工种为主，该村在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均处于劣势位置。

中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都位于多省交界处或国家边境，地理区位条件差。林村也是如此，该村所在市位于三省交界，林村又在市的边缘，远离发展中心，现代化水平低，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核心一边缘的地理区位中，技术创新、政策实施都从核心往边缘流动，资金、人才则集聚在核心城市，位于发展末梢的林村极为被动。

城乡二元的空间结构自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开始形成。农村相继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以低价收购农产品，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本。“多取少予”、“以农养工”的政策导致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空间的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通过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化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空间。至今我国农产品依旧表现出价格低、波动大的特点，农村劳动力扭曲的市场价格尚未解决，农村土地的流转和交易市场也还在试点改革之中。林村内的经济生产总体表现为碎片化、前工业化的山地农业，灌溉没有保障，耕种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农业生产的成果的一部分主要用于自我消费。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初级产业是村民外出务工不多的选择。

林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村中以前的蓄水池均由村民投工投劳修建，再肩担手挑到各家各户。林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近几年才初具成效：2012年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完成；2014年进寨公路实现硬化；2015年饮水安全工程修建自来水总管进村，2016年由村民各户出资增设支管到户。林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融、体育、文化等服务依旧相对匮乏。林村的结构性困境之下，村民们难以做出更好的选择。村民乙缺乏受教育经历和识字能力，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外出务工都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玉米种植的收益极低，不算劳动力的价值，扣除种子、农药、化肥之后每年仅有200元/亩的毛收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老且无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逐渐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他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

4. 产生制度依赖的“懒惰的穷人”

林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也是历史制度原因所致。此次国家主导的脱贫攻坚战正是试图改善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环境、发展乡村经济、帮助村民脱贫，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但是此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减贫攻坚工作却使得“懒惰的穷人”产生了制度依赖。

通过此次脱贫攻坚战，中国基层治理一改税费改革时期的“悬浮型”体制，通过地方政府和工作人员形成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直接互动。我国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制度的功能或效果是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能达成国家治理目标之外，制度通常也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背景或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行动者实践活动中，往往会对制度进行再阐释、改进和创造，从而产生制度的意外效果。^[30]中国政府于2015年打响了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要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此中央与贫困情况严重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扶贫攻坚“军令状”，层层落实扶贫责任。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突出体现了扶贫工作的政治性，^[31]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运动必须保证扶贫对象需无一遗漏，包括“懒惰的穷人”。在自上而下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运动式治理中，扶贫任务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基层工作人员的考核，导致地方政府扶贫工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策略来完成上级派出的政治任务，贫困户也深知“我脱不了贫，工作人员交不了差”。由此便产生了坐在家中，等着工作人员上门扶贫的“懒惰的穷人”。

在脱贫攻坚的基层工作实践中，不可否认也存在着类似村民丙这样“懒惰的穷人”，他们拒绝参与到国家的减贫项目之中，坐等国家制度兜底。村民丙因为家庭收入不足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列，2016年开始频繁有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家中，赠送免费的鸡苗、为其办理扶贫贷款、铺设水管、修葺门窗。村民丙将鸡苗养在屋内，因为通风条件差，

三十只鸡染上传染病死去。2017年他收入极少无法完成脱贫任务，于是扶贫干部给了他一个低保名额，以此完成当年考核。2018年底，根据省级目标，市扶贫办要求所有贫困户实现“改厕、改厨、改圈”的三改标准。扶贫干部再次前来村民丙家中做工作，但是村民丙他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并没有改善的需求和动力，到了最后的考核期，依旧是由扶贫干部为其房屋进行改建。有些村民甚至会利用“贫困户”的身份与工作人员讨价还价获取个人利益，成为了脱贫攻坚中的“钉子户”。此类具有制度依赖的“懒惰的穷人”是我国压力型体制下运动式扶贫的产物。

5. “懒惰的穷人”的贫困文化

已有研究指出，前人惯于使用的“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是对刘易斯贫困文化论^⑥的误用，试图将阻碍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传统文化污名为贫困文化。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与其说贫困文化的存在产生了贫困现象，不如说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长久以来难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而形成了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再生产了贫困。^[32]

在林村我们也观察到了此种贫困亚文化，部分贫困人口采取了一种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对市场和扶贫干预都缺乏积极的反应和行动力。此种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背后有两种表现，一是村民存在风险顾虑，在个人发展经历中多次受挫，丧失发展信心；二是村民个体无法融入“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因此采取“为使用而生产”的生存生计。此种贫困文化也是在二元结构、历史制度和生存环境中形成的。

林村的产业扶贫计划是通过种植苹果、樱桃、枇杷等多种经果林，替代玉米种植，实现脱贫增收，但是村民丁不愿意参与其中。林村自2010年起就曾经尝试过核桃树、枇杷树种植、土鸡、香猪养殖等多种扶贫项目，但是因为市场价格波动、缺乏种植养殖技术支持、自然灾害、疾病传播等原因，林村的扶贫项目鲜有成效，村民对国家发展干预渐失信心。除了林村发展项目的多次失败之外，村民个人经历的多次受挫更使得其缺乏发展动力。村民丁年轻时曾在外面做生意跑运输，但是正如他所说“做啥都没有什么起色”，在经历了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之后就不再愿意外出务工，再加上因脑血栓导致左手无力，村民丁现在只能在家务农。我国社会安全网建设不完善，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低，面对反复的国家发展项目，村民不再具有信心和动力参与其中。

“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经济逻辑已经被广为接受和应用，但是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边远乡村，“为使用而生产”的生计模式仍然是生产的重要功能。村民丙进行玉米种植主要是为了满足自食需求和饲养牲畜家禽的需求，而不是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获得现金货币。村民丁的现金收入和现金消费极少，这成为他“贫穷”且“懒惰”的证明。村民受当地社区文化的影响，不仅因为语言、文化的独特性会限制社会流动，而且非经济理性的文化因素也会影响村民的生计策略。基于村寨的集体信仰和集体人情、低度村寨经济分化和缺乏财产意识的社会秩序，村民过着低度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低产出的糊口农业和非积累性的外出务工方式。^[33]

6. “懒惰的穷人”的家庭与个人因素

很多基于全国性样本或区域性样本的研究都表明更大的家庭规模、更高的抚养比与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联系在一起，^[34-35]老年贫困与女性贫困也都是世界范围内一直备受关注的內容。村民戊是离异归家的中青年女性，家中有需照料三个孩子，以及两

^⑥①刘易斯在1959年出版的《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一书，通过民族志的个案研究指出了从农村迁入城市的移民家庭由于长期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饱受贫困压力的这些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为了应对无处不在的贫困状况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

位老人，从孩子父亲处得到的赡养费十分有限，此种家庭结构是其缺少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的重要原因，但正因为村民戊没有参与劳动市场、没有货币收入从而被认为是“懒惰的穷人”。

家庭成员和个人的人力资本也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原因之一。林村村民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毕业为主，人力资本限制了外出务工的选择范围，工资水平较低，且劳动保障缺失。案例中的五位村民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都相对较少。

我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一个新兴的贫困群体，他们具有贫困性和弱势性，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四个维度都面临社会排斥。^[36]在性别失衡的中国人口结构中，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由于受到婚姻挤压和婚姻排斥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多数农村“单身汉”经济条件较差，因此在婚姻市场中落于弱势，使得家庭再生产受阻，家庭劳动力数量又会进一步影响家庭经济收入。除了村民甲之外，村民乙、丙、丁都是年龄较长的农村“单身汉”。他们缺乏资本，参与劳动和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根据“贫困落后不光荣，好吃懒做难娶妻”的逻辑，他们没有家室的状况便是因为“懒惰”。

因为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因素影响、结构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家庭和个人原因导致村民缺少参与生产劳动和市场经济的机会，难以实现资本积累，村民甲、乙、丙、丁、戊五人都因为不符合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而被认为“懒惰”。因为货币收入低、现金消费少而“贫穷”。他/她们不是“懒惰的穷人”，而是大规模国家扶贫干预下仍然陷于贫困陷阱，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的低收入群体。

五、总结

“懒惰的穷人”这一具有道德劣势的人格主体的形成经历了17~18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的殖民主义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并在我国的道德景观中扎根，成为了具有道德劣势的人格主体。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懒惰的穷人”容易被简单标签化，无论“精神贫困”还是“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都是在减贫干预的艰难时期，忽视了贫困形成的结构、制度和环境影响，将致贫原因内生化的归因结果。

通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因素影响、结构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家庭和个人原因都是大规模国家扶贫干预下仍有低收入群体陷于贫困陷阱，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的重要原因。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了贫困村民的资本积累；在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的市场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改变、城市生活成本不断增长等区域经济因素影响下，贫困村民外出务工机会减少；经济和产业结构、地理区位、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林村村民难以逃离的结构性桎梏；在我国压力型体制下的运动式扶贫使得贫困村民产生了制度依赖；消极被动的贫困文化背后是村民个体无法融入“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因而采取“为使用而生产”的生存生计策略；以及贫困家庭结构特征、性别、年龄和人力资本条件都是贫困人口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的重要原因，而非简单归结为“懒惰的穷人”“安”于贫困，无发展的内生动力。

因为以上原因缺少参与生产劳动和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林村这五位村民，不受现代化大生产的时间节律的规训，违背了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被赋予与“勤劳”、“效率”、“理性”相悖的“懒惰”的特质，并在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成为贫困的首要解释原因，由此这类低收入群体成为了他者眼中的“懒惰的穷人”。

脱贫攻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面对“懒惰的穷人”时，背后是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经济因素影响、结构困境、制度依赖、贫困文化，以及家庭和个人因素，因此采用“扶贫产业”、“劳动力转移”等手段都难免束手无策。基层工作人员只能采取低保兜底、金融扶贫入股分红等短平快的应对策略来完成上级派出的政治任务。最近提出的“精神扶贫”只是“素质贫困”、“文化贫困”的老调新弹，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加剧对低收入群体的道德污名化，阻碍脱贫攻坚的顺利实现。

本文倡导跳出“精神贫困”的分析视角，回归到综合性的贫困分析框架来分析“懒惰的穷人”的产生，由此我们会发现在大规模国家扶贫干预下，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因为陷于贫困陷阱，无脱贫机会、能力和意愿并不是因为“懒惰”，背后结构性制

度性的问题更为关键。“懒惰的穷人”无脱贫之志、内生动力不足只是其外在表现，减贫发展应致力于破解结构困境，建立完善制度. 扩大村民选择空间以助其跳出贫困陷阱，而不是通过对“懒惰的穷人”的道德污名化来避开改革深水区、逃脱对贫困人口脱贫责任的。

参考文献:

- [1]袁英. 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精神扶贫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9.
- [2]高圆圆, 范绍丰.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精神贫困探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06).
- [3]张志胜.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J]. 西北农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3).
- [4]杭承政, 胡鞍钢. “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04).
- [5]孙咏梅. 中国农民工精神贫困识别及精准扶贫策略——基于建筑业的调查[J].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02).
- [6]穆光宗. 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J]. 社会科学战线, 1995, (05).
- [7][32]李文钢. 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5).
- [8]李小云.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贵州社会科学, 2013, (07).
- [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报告(2007):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 [10][15]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1]Darier e. Time to be Lazy: Work, the Environment and Modern Subjectivities [J]. Time & Society, 1998, (02).
- [12][20]Lafargue P. The right to be lazy and other studies[M].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07.
- [13]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4]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6]Siegel B. The “Wild” and “Lazy” Lamba: Ethnic Stereotypes on the Central African Copper-belt [M].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Vail, London and Berkeley: James Curre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17]Alatas S H.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M]. London and Oreg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7.
- [18]Sharma J. Lazy’ Natives, Coolie Labour, and the Assam Tea Industry[J].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9, (06).

[19][21]C, 斯科特·詹姆斯. 弱者的武器[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22][23]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 发展理论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4]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25]俞茹.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3).

[26]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03).

[27]周侃, 樊杰. 中国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和云南怒江州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01).

[28]郭君平, 谭清香, 曲颂. 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测量与分析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09).

[29]盛亦男, 孙猛. 农民工返乡的经济学分析——以托达罗模型为视角[J]. 人口研究, 2009, (06).

[30]洪大用. 当道义变成制度之后——试论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3).

[31]邢成举.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05).

[33]吴海龙. 传统型贫困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村落贫困生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0).

[34]杨龙, 汪三贵.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10).

[35]江克忠, 刘生龙.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08).

[36]孟阳, 李树茁.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 探索与争鸣, 2017, (04).